

TRANSLATION
ETHICS

翻译伦理学

彭 萍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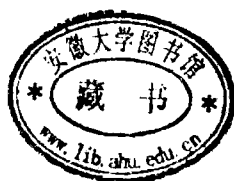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RANSLATION
ETHICS



翻译伦理学

彭 萍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伦理学 / 彭萍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117 - 1561 - 6

I. ①翻…

II. ①彭…

III. ①翻译学 - 伦理学 - 研究

IV. ①H059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9260 号

翻译伦理学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序

辜正坤

康德在《道德理性考察》(*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一书的结论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越反思越觉得它们令人赞叹与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①

作为伦理核心的道德法则是人类精神世界上最伟大、最令人敬畏的东西。人类的一切别的精神财富离开了道德法则的羁束就可能走入歧途。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科技……概不例外。

翻译和翻译理论当然更不能离开道德原则。

古今中外的一切翻译和翻译理论总是势所必然地和道德伦理问题纠缠在一起。

佛教经典的翻译、《圣经》的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中国清末民初的翻译,虽然有其他若干引导因素,但首先是出于译入语民族对某种人类精神原则或价值观的兴趣才会产生。这种翻译行为往往如洪水天降,势不可挡。

伴随着巨大的翻译活动而来的必然是对翻译行为本身及其相关因素

^① 此书名一般译作《实践理性批判》。但实际上这部著作讨论的就是伦理学问题。康德不是在批判实践理性,他是在建构一种符合他的哲学理论的道德体系。德语 *Kritik* 在这儿不是现代汉语“批判”的意思,而是“研究”、“考察”、“甄别”、“裁定”或“鉴定”的意思。因此我意译作《道德理性考察》,这样,中国读者便容易看懂标题的寓意了。同理,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也不宜译作《纯粹理性批判》,而应译作《纯粹理性考察》之类的书名。不赘。

的阐释。这样的阐释即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不仅会阐释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对象、翻译技巧、翻译作品等本体性翻译因素，也会阐释翻译主体、翻译受众、翻译语境、翻译文化等诸多泛翻译因素。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制于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

必须有专门的著作探讨如此重要的翻译理论课题，否则，翻译理论系统就是有重大缺陷的理论。

在一定的意义上，彭萍博士的《翻译伦理学》至少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填补了这一个重大的理论空缺。

此书有一些特点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作者不是单向地到西方文献里去寻找相关的学术资源，而是力求做到中西汇通，将中西方的伦理学思想都融汇到她的研究中来。其实，就伦理学来说，中国的伦理学资源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儒家的最大的成果就是伦理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道、佛三家的学说恰恰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研究和阐释。作者对这些东西都给予了适当的关注，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第二，作者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更不是像有的学者那样简单编译一些西方文献资料、梳理出一些西方思想（虽然这样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意义），而是非常注意将中西翻译伦理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使这种研究能够有的放矢，从而能够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建设。

第三，作者比较重视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体系，时时引用这些思想来充实、论证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四，本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涵盖面相当广泛，可以说是目前同类著述中论述最全面者，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翻译伦理学专著。作者立足于中国的翻译和社会现实，将翻译相关活动加以细致划分，运用翔实的资料系统地研究了翻译伦理学所包含的方方面面，从伦理视角审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活动、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方面，探讨了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内容、研究任务等，并使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详细分章论述了翻译伦理学的上述诸多方面。作者还就如何纠正翻译研究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如何处理译者的两难选择、翻

译工作者的“隐形”和“显形”问题以及“重译”、“容错率”、翻译工作者的版权、署名权、翻译批评中的伦理标准等，进行了讨论，同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国内外在翻译伦理学方面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往往是单篇文章，缺少完整性和系统性，尤其是缺少基于中国伦理传统和翻译现实的系统化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彭萍博士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未来的翻译伦理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使从整个国际领域来看，她的研究成果也是走在领先行列的。这是中国学者的骄傲。我为此热烈祝贺。诚盼彭萍博士能够再接再厉，在此领域作出更重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2 年 10 月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序	辜正坤
第一章 导 言	1
一、翻译的文化研究背景与传统	1
二、伦理：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10
三、翻译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翻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15
四、翻译伦理学：社会现实的呼唤	18
五、对翻译伦理学的总体思考	21
六、本书结构	25
第二章 翻译伦理学的伦理学基础	27
第一节 伦理——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	28
第二节 中西方的伦理传统和当代对伦理的反思与回归	35
一、伦理中国	35
二、对中国伦理精神的反思与回归	47
三、伦理在西方	53
四、对西方伦理精神的反思与回归	59
第三节 职业伦理概述	62
本章小结	65
第三章 翻译伦理学的翻译学基础	68
第一节 什么是翻译学	68

第二节 翻译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77
本章小结	86
第四章 翻译伦理学概说	88
第一节 翻译伦理学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和任务	88
一、什么是翻译伦理学?	88
二、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90
第二节 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	93
第三节 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96
第四节 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00
本章小结	103
第五章 伦理与翻译理论	105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中对伦理的关注	105
一、翻译的“善”、“信”论	105
二、译者“道义”论	108
三、翻译的“救国”、“益群”论	113
四、翻译的“教化”、“功利”论	118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译论中的伦理关注	120
一、译者的责任和义务	121
二、翻译批评中的伦理问题	123
三、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伦理关注	125
四、对翻译伦理的综合关注	127
第三节 西方传统译论中对伦理的关注	134
一、“忠实原作”的伦理	134
二、对目的语读者负责之伦理	136
三、译者本身的职业伦理	137
四、丰富目的语之伦理	139

五、宗教伦理	140
第四节 西方当代译论中的“伦理转向”	142
第五节 用伦理来规范翻译研究	162
本章小结	172
第六章 伦理与翻译活动	174
第一节 与译者相关的伦理问题	176
一、译者的基本职业伦理	178
二、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文本选译	184
三、“忠实于原作”之伦理	191
四、“忠诚于读者”之伦理	195
五、当“忠实于原作”与“忠诚于读者”发生冲突	206
六、不同文体的翻译伦理	213
七、译者应该从“隐形”变为“显形”	225
第二节 中间人伦理对翻译的操纵	235
第三节 读者伦理与译本的接受和传播	245
第四节 从伦理的角度看重译	251
本章小结	255
第七章 伦理与翻译批评	257
第一节 翻译批评的定义和作用	257
一、翻译批评的定义	257
二、翻译批评的作用	258
第二节 伦理视角——翻译批评不可忽视的一环	263
一、翻译批评者的职业伦理	264
二、翻译实践的批评伦理	265
三、对翻译活动中各要素的批评伦理	269
四、不同文体的翻译批评伦理	272

五、翻译理论研究的批评伦理	274
本章小结	276
第八章 翻译教学中的伦理	278
第一节 翻译教师的职业伦理	278
一、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279
二、良好的专业素质	281
第二节 翻译课的学生伦理	287
本章小结	291
第九章 翻译伦理学对中国译界的启示	292
第一节 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292
第二节 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实践的启示	297
第三节 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批评的启示	302
第四节 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教学和培训的启示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30

第一章 导 言

一、翻译的文化研究背景与传统

文化一直是一个与人类发展密不可分的主题，因为文化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形成系统性的“文化研究”这一学科而且迅速升温，则可以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后殖民主义（也称“文化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互联网的产生和迅速蔓延，都促使文化研究成为必然。具体说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①，80年代初开始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拓展和丰富，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多元发展态势”^②。随着文化研究波及中国、印度、韩国等更多的国家，文化研究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之所以在全球升温，是有着其社会背景的。正如陶东风指出：“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对于文

① 陶东风认为，作为专门词组的“文化研究”特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又译作“威廉斯”——笔者按）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于1964年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并任首任主任。这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也是它在学院内建制化的标志。（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同时，霍加特于1957年发表的《有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威廉斯于1958年发表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以及汤普森（Thompson）于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开端。（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Bassnett &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130.）

② 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化的危机意识在全球随处可见：对于何为进步或普遍价值的共识的丧失，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地区等之间的文化分化的加深，各种暴力形式的急增，因特网的全面发展，由于新兴的非西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权威的挑战而导致的新的世界混乱状态以及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等等。”^① 在西方，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伊斯特雷普（Easthope）将西方文化研究归纳为三个阶段：（1）20世纪60年代致力于拓展文化概念使其涵盖大众文化，这一时期称为“文化主义阶段”（culturalist phase）；（2）20世纪70年代以探索文本性与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这一阶段称为“结构主义阶段”（structuralist phase）；（3）其后以确立文化多元主义为特点，称为“后结构主义阶段”（post-structuralist phase）。^② 文化研究的话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通俗文化、阶级文化、通俗媒介（戏剧、新闻、音乐）、日常生活、城市与市郊、主体性、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力、可视性以及其它非言语意指（non-speech semiosis）、身体、身体与技术、公与私的关系、制度和人的关系、文化政治、边缘人与边缘实践得以成长的环境、跨国知识与图像流、非都市文化之间的殖民参与与帝国残余等。^③ 王洪涛指出：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又表现为种族研究或族裔研究（race studies）、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以及大众传媒研究（media studies）等多种类型，而从中细化出来的以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为研究对象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以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主义研究更是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热门

①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② 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2页；Bassnett, S.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 in Bassnett &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131.

③ 哈特利（Hartley）：《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话题。^①

无论是文化研究的开始还是当代的文化研究，从中都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式研究，内容非常宽泛，那么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必然可以而且已经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因此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文化转向”的概念在西方提出，迅速在全球翻译领域蔓延开来，于是全球掀起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热”，中国也毫不例外。这和文化研究介绍到中国来以后的情形一样，陶东风指出：

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②

当然，中国的文化研究迅速升温，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来源于当代学人对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度和灵敏度。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人们对很多的文化现象给予了比以前更高、更广泛的关注，对社会道德、大众文化、人文思想等各种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开始反思，所以，中国的文化研究不仅是中国学术受到西方影响的一种表现，更是在这一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研究传统的一种延续。

尤其是纵观中国的翻译史，文化一直与翻译行为紧密结合。佛典翻译带来了佛教文化与中国儒道文化的融合，丰富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包

① 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②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括词汇、绘画、音乐、建筑、雕塑、观念等。具体说来,从汉朝到唐朝,由翻译产生的词共有 35000 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佛经传到中土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翻译活动就是佛典的翻译;佛经翻译不可能总是四言八句的工整对仗,所以打破了中国原来的文风,对我国语言走向白话文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中国文学和文论也都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如“境界”一说,同时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的题材源于佛典文献或者受到佛经的影响,如《红楼梦》的开头、《西游记》以及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容和情节等;佛典翻译还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带来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不同朝代、不同阶段的统治者对待三家思想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都旨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另外,佛经的诵咏丰富了中国的音乐艺术,佛典的翻译带动了佛典的传播,从而带动了佛塔的建设和石窟艺术的发展,不能不说中国的建筑艺术中有很多佛教艺术的烙印。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翻译更是一种文化热潮,是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文化以改良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不仅通过翻译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经济、法律、哲学、逻辑、文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在上述这些翻译活动中,其翻译策略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文化目的。譬如,佛典翻译时期,尤其是初期,译者采取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策略,包括对“以人为本”观念、“孝尊”观念、“两性关系”、“社会等级秩序”等的屈从适应,^① 实际上是为了使佛教更好地被中国人所接受,达到宣传佛法的目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虽然选取的大多是科技翻译,但也是本着“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进行的,这一时期以李善兰和徐寿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人合作进行翻译,根据汉语的造字法和造词法创立了许多科学术语,如数学、化学等方面的术语;维新派翻译家严复在翻译中使用了增删附益的方法,甚至是重写的策略,实际上在于更好地启迪中国人民;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家瞿秋白和鲁迅主张

^① 参见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26—34 页;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第 151—161 页。

“直译”，其目的都在于丰富中国的白话文，在这两位知识分子看来，翻译至少可以帮助完成四大任务：（1）改造中国的文字；（2）改造国民的劣根性；（3）毁灭掉封建传统思想得以容身的媒介；（4）最终帮助完成中国新文化的建设。^① 以上是中国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目的举例。实际上，中国的翻译家在谈论翻译的时候也都带有明显的文化倾向。中国的翻译理论大多是翻译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总结，是有感而发的，其理论中的文化倾向与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倾向密切相连，譬如傅雷先生提出的“神似”说和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分别与中国的临画艺术和文学艺术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一直带着深刻的文化印迹。因此，在西方翻译界产生所谓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动下，中国翻译界学者也开始从传统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更多地转向翻译的文化研究，这种现象在辜正坤看来，并不是“转向”，而是“回归”，或者说“回向”，因为早在 100 多年前的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就已经出现大规模的文化翻译热潮及与之并起的热烈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整合、改良文化走向的有力工具而加以研究的趋势。^②

在当代，中国不少学人也提出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王佐良先生早在 1984 年就撰文提到翻译研究中文化比较的重要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

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一个有心的译者往往感受也特别深切，尤其在两种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但是我们所知无多，而想提的问题不少。例如：高僧们在翻译过程中有些什么体会传了下来？为什么他们有时意译，有时则把词句连音照搬过来，甚至整本经都这样？有些什么经验教训？此外，我们难道不能透过译本去

① 辜正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中国文化学派的兴起》，引自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序文第 14 页。

② 辜正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中国文化学派的兴起》，引自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序文第 9 页。

看看当时中国文化的状况——语言的情况，宗教的情况，人们学习外语的情况，士大夫的思想情况，一般人的心理情况等等？那样一深入，一扩大，我们的翻译史也就会写得更活也更富于启发性了。^①

这里，王佐良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翻译研究要与文化结合起来。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严复、林纾和鲁迅翻译中的文化主张，认为这三位翻译家在翻译中都主张进行文化比较，“不论比较同与异，翻译界前辈中的有心人总是在寻找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东西，从起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爱国主义，直到后来的马列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②。王佐良先生进一步提出：

如果我们能进而探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或者更进一步把它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那就会增加一整个新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能使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更能透视全局，纵观古今，更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提高实际效能。单从这一点看，翻译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总之，它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本身积累了无数世代的经验亟待总结提高，又出现了若干现代学科与之交叉；它是一种老艺术，又是一门新学问。^③

季羡林先生也曾经高度评价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的作用。他认为中华文化这条长河就得益于有新水注入，最大的两次分别是印度来的水和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水的注入靠的就是翻译。因此，季羡林先生将翻译视为中华文化长青的“万应灵药”。

①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引自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04—705页。该篇文章发表于《翻译通讯》1984年第1期，后来收入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

②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引自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08页。

③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引自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11页。

如前文所述，正是全球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的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和图里（Gideon Toury）提出的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被视为西方翻译中文化转向的萌芽，而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于 1990 年明确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一概念和口号，被视为西方翻译研究的转折性观点。不少学者纷纷响应，认为翻译走出了传统的语言学派的藩篱，走上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实际上，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偏重而已，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文化翻译理论传统一直存在。譬如，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Cicero）和贺拉斯（Horace）对翻译的讨论“是在诗人两个主要功能的更大背景下展开的，即人类获取和传播智慧的共同责任的功能以及使诗能成为诗的专门艺术的功能”^①。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翻译风格取决于译文读者的要求，实际上暗含着翻译的文化目的。中世纪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和阿尔弗里克（Aelfric）在谈到宗教翻译时都认为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这也说明翻译宗教实际上是为了传播宗教之目的。13 世纪是欧洲各国用民族语翻译《圣经》的一个高潮，这是因为各民族都有想真正了解《圣经》的迫切心情，那么坚持用人民大众的通俗语言翻译《圣经》的主张在当时占据了主要地位，以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代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翻译高峰期，当时以文学翻译为主，这些翻译为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和中国翻译一样，西方翻译史上的文化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只不过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倾向”尤为明显。80 年代，兰姆伯特（Lambert）等人开始认为，与其将翻译看做是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不如将之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德国的斯奈儿-霍恩比（Snell - Hornby）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

①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 页。